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主 编 吴文莱 副主编 高德民 梁振兴

珠海出版社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主编 吴文莱
编委 高德民
梁振兴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编委会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7-609-3

I. 容… II. 容… III. 容闳(1828~1912)-纪念文集 IV. 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740 号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主 编■ 吴文莱
终 审■ 成 平
责任编辑■ 伟 林 向 群
装帧设计■ 李华强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二层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24.25 字数 545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80607-609-3/K·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序 言

章开沅

去年是容闳诞生 170 周年，“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Chinese Students Memorial Society）和耶鲁大学，于 9 月在他工作多年并最终定居的哈特福德（Hartford，美国康州首府）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容闳和他当年率领的留美幼童后裔 40 余人聚会。随后是 11 月下旬在他的出生地珠海，由市政府出面主办《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有众多中外学者参加，提交论文 50 余篇，讨论非常热烈，并且提出许多推动容闳研究的很好建议。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忘记容闳，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大多是长期接受传统教育，然后走出国门看世界，获取新知以后回国推动各项革新。惟独容闳是从小到大在海外接受比较完备的西方教育，然后回国投身维新与革命活动。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不同的世界观，容闳实际上早就形成了适应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世界观。只是由于他平生事业重在实践，同时也由于他不善于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因而未能在这方面多作自我表述罢了。

容闳平生事业有四大端：协助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此其一；倡导并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此其二；参与维新变法此其三；促进革命运动此其四。这四件事都是开风气之先，都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才干，才能在专制高压、封闭守旧的社会环境

中有所成就。人们常说容闳的可贵在于“与时俱进”，意即他的革新主张与实践经历器物（办工厂）、精神（创新学）、制度（从变法到革命）三个层面。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把容闳等同于其他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不尽符合容闳的心路历程。因为，容闳在美国所接受的多年文化熏陶，特别是在耶鲁大学的系统教育，他早已具有民主、自由与共和国思想。所以，他的1854级级友的临别赠言，才会出现“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愿你回归天朝帝国之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等诚挚话语。1860年他从上海前往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相当认真的实地考察，给洪仁玕的七条建议，已经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个方面的革新。其后在《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和十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中，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革命的同情和推翻清朝政府并建立新国家的向往。

容闳在耶鲁大学临近毕业之际，即已立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大志愿，并且“又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其目标与规画都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他实行的具体步骤却不能不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容闳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回国初期成为所谓边缘人物，既难以为主流社会所接纳，也未能为农民起义军所认同。他所拥有的“西方之学术”，无论是灌输还是移植都需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凭藉，个人赤手空拳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他在香港学律师，在海关当翻译，在洋行任职员，无非是谋求生活自立的支撑点；投奔曾国藩和会见洪仁玕，才是他寻找灌输、移植“西方之学术”的依托力量。太平军领导人的晚期腐

序 言

化蜕变终于使他失望，暂时放弃了激进变革的试探；而洋务派官僚的趋向某种程度革新，却使他有可能实现办新式工厂与率幼童留学，迈开以西学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的第一步。但洋务派官僚并未给他一个挥洒自如的空间，守旧势力的阻挠与攻讦则使他的留学计划半途而废。于是他把眼光转向新起的维新运动，随即又通过堂弟容星桥与孙中山结纳，积极促进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容闳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也可以说是知先于行或行其所知，这是 he 与其他许多先驱者思想发展轨迹不同之处。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容闳的名字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的生平事迹确实体现了西学东渐的潮流，而且还因为他的自传中译本被命名为《西学东渐记》，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容闳仿佛是西学东渐的代号。其实这本用英文撰写的自传原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直译应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中文译者把它改名为《西学东渐记》，可谓画龙点睛，深得其神髓，决非误译与歪曲。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亚洲）一股强劲的潮流，真说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因而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自传的原名反而在故土被遗忘了。

容闳为西学东渐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世人所知晓，但他为东（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却不大有研究者提及。十年前，我查阅耶鲁大学馆藏容闳档案，发现他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词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 1854 级众多美国级友赠别。其后，他担任中国留学生监督，在哈特福德工作六年之久，不仅督促留美幼童学习中文经典，而且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

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中西文化交流本来是双向交流，即令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何况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and 极为丰富的内涵。西方人为东方文化的固有魅力所吸引，故国文化的基因必须要在与美国同学、友人长期相处中有所展现，这就是容闳致力于东（中）学西渐的缘故。就传统文化的素养与实力而言，容闳诚然不及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大学者，但他对西学和西方社会的熟谙，却又使他在东学西渐工作中具有自己的优势。

过去，人们往往误把容闳看作业已归化美国的假洋鬼子，其实他终身抱持着牢固的中国情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正如他给美国级友临别赠言所说的那样，胸怀松柏之志，常保赤子之心，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在临终之前获知故土推翻君主专制与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喜讯，并且立即敦促自己的儿子回国为新政府效力。他惟一的遗憾是长期羁旅北美，未能重返故土而终于客死异域。但这决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是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把他排拒在国门之外。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他虽然被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容”字图案，却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与容闳的崇高历史地位与深挚情怀相对比，我们过去对他的研究是太不够了。我希望以这次《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为新的起点，将有更多的学者对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业绩作更为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目 录

目 录

序言 章开沅 (1)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他的 170 周年诞辰 戴学稷 徐 如 (1)

论容闳的报国心 林家有 (15)

容闳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 朱新镛 (32)

从渐变到质变

——略论容闳思想的两次飞跃 任贵祥 (40)

容闳思想述论 丁旭光 (54)

容闳一百七十年祭

——兼论留住中华学人的根 胡公展 (74)

论容闳教育救国思想 梁碧莹 (92)

容闳与近代“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 黄顺力 (109)

略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及活动 李振武 (120)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容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冀满红 陈旭清	(140)
容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邵 纯	(147)
边际人的报国心		
——容闳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新论	罗福惠	(159)
“边缘人”的角色尴尬		
——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	李细珠	(177)
中国留学生之父		
——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石 霓	(190)
简论近代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	刘学照	(232)
容闳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马克锋	(243)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胡 波 林有能	(255)
容闳与中国现代化	朱育和	(272)
容闳的近代化观念及其价值	肖承罡	(281)
试论容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杨 穆	(293)
容闳的“西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梁伯华	(307)
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陈汉才	(323)
容闳及其师友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	刘圣宜	(342)
容闳谋求中国近代化的三次重要抉择	段云章	(357)
容闳与洪仁玕的中国近代化方案比较	方志钦 刘志强	(375)
为祖国近代化的首次尝试		
——关于容闳 1860 年的金陵之行	王汝丰	(388)
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	李吉奎	(393)
容闳的维新中国活动	肖一亭	(402)

目 录

论“容闳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曲士培 吕春红	(414)
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 高宗鲁.....	(422)
从《西学东渐记》看容闳的兴国思想与实践 盛永华 孙关龙	(467)
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冀满红 周山仁.....	(479)
容闳：一个与晚清历史巨变脉络相吻合的探索者 郭世佑	(489)
“西学东渐”的起点 ——容闳 16 年求索的心路历程 李国伟	(504)
略论西方文化对容闳的影响 ——读《西学东渐记》札记 宋德华.....	(528)
从容闳谈到中西文化交流 黄勋拔.....	(543)
从“西学东渐”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王孙禺 刘 俊	(552)
先驱者的足迹 ——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章开沅.....	(563)
《西学东渐记》“代跋”汉译商榷 欧阳鑫.....	(581)
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 吴义雄.....	(586)
容闳之留学教育近代化理念与鲍留云牧师之关系 李志刚	(605)
容闳与辛亥革命 陈志雄 罗建军.....	(623)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戊戌时期容闳与维新派的若干关系 汪叔子·····	(639)
谈容闳与曾国藩的十年同路关系 闵传超·····	(661)
论容(闳)丁(日昌)交谊 赵春晨·····	(678)
容闳与丘逢甲 赵立人·····	(691)
容星桥：容闳与孙中山的接触点 容应萸·····	(700)
同时代人对容闳的看法 ——析张文虎赠容闳诗二首 周振鹤·····	(718)
容闳与上海 苏智良·····	(724)
容闳外交事务和摄影术 徐 新·····	(735)
容闳与澳门 陈树荣·····	(739)
容闳与《西学东渐记》 钟叔河·····	(745)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他的 170 周年诞辰

戴学耀 徐 也

容闳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为中国近代化而奋斗毕生的先驱者。他在 80 多年的忧患生涯里，一直密切关心并积极参加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为振兴中华，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临终时还嘱咐他两个在美国生长的儿子，必须回国为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效力。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中国的留学事业，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开辟道路。

今年是容闳诞生 170 周年，特以此文纪念这位对中国有过重大贡献的先贤。

一

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容闳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多方面的行动上，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他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有着一颗永远跳动的“赤子之心”。

容闳生长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和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祖国的落后家庭的贫穷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艰辛，给他以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他自述道：在美国留学时期“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①。因此，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他拒绝了美国教会要他“保证毕业后回中国做传教士”的助学金，而宁愿通过艰苦的半工半读生活，以便以后行动上有完全的自由，“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他认为接受这种助学金，签订了“这种性质的誓约，会妨碍我利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提供的条件而去为之效力”。他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成为先进的强国作为自己学成回国后的奋斗目标，作为一项至高无上的使命进行不懈的追求。他在自传里写道：“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自己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为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②他是这样要求自己，以后他也是这样努力的。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容闳在美国。他说，“我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漠不关心，不能抑制我对中国的热爱”^③，因此他特地给以前同在驻美公使馆工作的翻译兼秘书蔡锡勇写信，提出他的救国建议和具体方案，蔡锡勇将容闳的意见呈交给他任幕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容闳因此被召唤回国。虽然这些建议后来并未能实现，但容闳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使他参预了紧接而来的一场重大政治变革——戊戌“百日维新”。

容闳在他 1854 年 5 月大学毕业前就给自己写下作为自勉

^{①②③} 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王秦译，（在本文内以下简称《追忆》），中华书局，1991 年 10 月版，第 25 页；第 23、26 页；第 127 页。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的“座右铭”用中英文对照并注上普通话的读音。这个座右铭是“大人者（伟大的人物）不失其赤子之心”（“The great man never forgets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他以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直到临终时都还保持了这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四五十年后的1911年12月22日，时已83岁的容闳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和各省热烈呼应后清政府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来抵制革命军时，他写信给在香港的爱国华侨谢纘泰道：“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他明确提出：“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① 1912年2月2日，当他得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他又写信通过谢纘泰向孙中山致贺。这时他已重病缠身，他要求谢纘泰转告孙中山：“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②，其时距离他4月21日病逝只有一个多月。他是多么地恋眷着祖国，希望他魂牵梦羁的祖国进步和富强啊！遗憾的是终未能如愿。

其次容闳不仅热情关切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而且积极投身于爱国和改革的政治斗争。

容闳于1854年学成归国前后，他极其关心当时正处于高潮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早在1853年7月27日他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就曾写信给在美国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请立即告诉

^{①②} 《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23页；第326页。

我这次革命的情况，我对它所有的活动都极感兴趣。”^① 回国以后，他对反清的农民起义极表同情，斥责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与英法侵略者勾结残酷镇压陈开、李文茂等率领的“红兵”起义军惨无人道，认为太平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产生了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的念头。1860年他终于有机会到太平军占领区和统治中心“天京”去参观，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改革的建议，表示“愿贡献力量，以促成其事”。但通过这次实地观察了解，他同时也发现了太平天国的根本弱点，而失望地婉辞了干王洪仁玕邀请他留在那里赞助太平天国的事业。^②

容闳于1895年又一次回国，虽然他因此行提出的筹办国家银行和修筑南北交通干线津镇铁路的两项建议均未告成而深感失望，但他很快地又积极参加了随即发生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运动，他在这次大变革中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主要人物来往频繁，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北京的寓所成了维新派主要人物秘密集会的地方。维新派也都因容闳的特殊身份而对他特别倚重。“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由于同情和救助维新派人物受到牵连而逃到上海租界里。

谭嗣同等“六君子”遭到捕杀，康、梁逃亡海外，他们的同党唐才常秘密筹划“自立军”起义的同时，1900年7月在上海以“自立会”为核心组织“中国议会”（或称“国会”），容闳又积极参与了这个活动。在“中国议会”于7月26日在愚园正式成立会上，容闳以最多票当选为会长，严复被选为副

^① 容闳未刊手稿（英文），藏于耶鲁大学，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131页注①。

^② 见《追忆》，第六章“回国”，第十章“访问太平军”。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会长。会上容闳当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声雷动”^①。其后容闳又被推任外交事务，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而由严复译为汉文。“自立军”失败后，容闳被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香港，最后被迫到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十年。

第三，容闳的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他的思想和行动能跟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向前进，而不保守和倒退。

他热爱祖国的真诚愿望，促使他在复杂的历史事变面前，能够深切地顺乎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他为了探索 and 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方案努力奋斗了一生：先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向太平天国提出建议；而后参加洋务派主持的“自强求富”活动，倡议并领导我国政府第一次公派的出国留学教育；接着他积极投身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和在上海主持反对清朝顽固派的“议会”斗争；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晚年他在美国，虽已臻耄耋高龄，又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积极赞同者，热烈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谋求中国的复兴与富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扬达到更高的境地。

二

容闳最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中国的留学事业，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①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稿本），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43页。

容闳回国后在六七十年代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洋务活动，并非赞同洋务派所谓的“自强求富”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而是为了借助洋务派当权官僚的力量，实现前述的他立下的终身志愿，“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他自 1854 年学成归国经过 18 年的等待和不懈追求，终于在 1872 年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圆了他多年的报国梦。清政府在曾、李的联合奏议里批准了容闳的计划，从 1872 年开始至 1875 年连续四年，设立派遣留美学生的专门机构，选拔 120 名（每年 30 名）从 10 岁到 16 岁的“幼童”，作为第一批官费生赴美留学。

然而容闳苦心孤诣设计的这项谋求“改造中国”的留学教育计划，并没能按原计划使留学生们在美国各自学习 15 年，在完成他们的全部学业后圆满地归国。1881 年，在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下，容闳和全部留学生都被撤回中国。其时距预定第一期学成归国期限尚差 6 年，距第四期出国留学者学成归国的期限还有 9 年。在 120 名四期学生中，除中途因故撤回及在美病故未能学完的共 26 名外，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二人刚由耶鲁大学毕业，其余 60 名尚在大学，此外尚在中学。这对于刚发轫的中国留学事业不能不是重大的挫折，对于容闳和所有的这批留学生来说，更是个重大的打击和深深的遗憾。容闳企图通过他的这个教育计划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抱负也只能随之中途而废了。

尽管如此，容闳多年的努力，他的这个教育计划毕竟还是得到初步的实现，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还是起到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这些回国的留美学生虽然大多没有完成全部学业，

但归来后分配在洋务运动新办的企事业中，以他们熟练的外语、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较开阔的视野以及自己的勤奋努力，还是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些人以后多数成为外交、军事（主要是海军）、铁路、矿山、海关、邮政、电讯、教育、医学等各方面的骨干，有的还成为国内外显赫的知名人士，其中还有不下 10 人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的反侵略民族自卫战中英勇牺牲了成为民族英雄和烈士，而使社会上对于派遣留学的意义和影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就促进社会发展与国家富强的角度而言，还不曾有过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举。容闳的派遣青少年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倡议，对中国来说，确实是破天荒第一遭，是一个创举。容闳认为他的这一计划如能实现“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实际上并不夸张。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时期，我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科技发明创造始终居于世界前列，那时不会想到有派遣大批人员出国留学的需要。16 世纪之后，特别是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科技发明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中国则是大大落伍了。这时封建统治者仍在闭关自守、顽固自大，把西方科技发明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而予以排斥，不愿向外国的先进东西学习，因而容闳的这一倡议，使中国人能直接出国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汲取西方文明的成果，具有极为重大的积极意义。尽管他的这个计划仅得到初步和局部的实现就被破坏和中断了，但经他倡导，突破了原先长期的封闭状态，其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求，便不能不在社会产生现实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从 1873

年末开始提出，到 1877 年春成行的由沈葆楨主持的福建船政局派遣第一批留欧学习海军的官费生和以后陆续派出的第二、三、四批的实现。及至 20 世纪初，随着留学日本与欧洲各国热潮的兴起出国留学更蔚为风气。随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法勤工俭学、留苏热潮以至建国初期的留学苏联、东欧，以至改革开放以来空前规模的出国留学高潮，都是它的继承与发展。

可见，容闳当时留学计划的倡议，实开近代中国派遣留学风气之先。《近代中国留学史》的作者、中国教育史老前辈的专家舒新城先生写道：“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①事实正是如此，它的影响和作用积极和巨大的。这是容闳对祖国的一椿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国留学对于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要，这是由于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连不断地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就是因为中国落后，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落后就必然挨打、受压迫，出国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是为了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生产的经验，同时也是为了寻找拯救中国的出路，总之是为了振兴中华，使国家强盛、人民富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爱国官吏和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那时还主要局限于向来华的外国人士学习、翻译西方书报，购置外国的枪炮兵舰进行仿造，而还没有提出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问题。容闳以一个先行者的身份所提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民国 16 年（1927 年）9 月刊行，第 2 页。

出的倡议有力地影响了当权的洋务派官僚，首先他说服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又进而使为办洋务而迫切需要各种人才的曾国藩、李鸿章都同意他的建议而联衔向清政府奏请批准。他们把这件事说成是中国留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认为是“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①。他们陈述出国学习的目的是“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②

到了19世纪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时，他代新任京卿的杨深秀拟的《请派游学日本折》，所提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则主要从储备变法维新人才着眼，理由为：“我今欲变法而章程未具，诸学无人，虽欲举事，无由措理，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③，这已是从政治改革出发，希望借鉴外国的政法制度而培养骨干。

及至稍后的20世纪初年中国民主革命逐步高涨时大量的留日学生的普遍心态则是“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者，乃为求药之人”。换言之，当日的留学生是为了到西方国家寻找救国之良药，而他们认为：“惟游外洋者，为吾国唯一之方针”，“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④近代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民族忧患深重的年代，其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赴法英等国勤工俭学运动和赴苏俄留学热潮也莫不是为向西方和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寻求和学习救国的真理，随之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怀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

①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157页；第153页。

③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50页。

④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86、381、394页。

理想的青年学子更接连不断地负笈海外，但是只有当新中国诞生，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后，这样的理想才能得到完全实现，因此解放初期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学苏联东欧各国的有计划派遣和改革开放 20 年来空前规模的留学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为了加紧促进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政策和重要措施。这些数以十万计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们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军，在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实际上都是实现容闳当年的伟大理想的后继者。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在纪念容闳诞辰 170 周年时感到由衷的高兴，容闳老先生地下有知当会为此感到无比兴奋和欣慰，较之当年他获知清政府批准他所提出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时兴奋和欣慰的程度自必要高出许多倍。作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在这方面的影响，逾越了一个多世纪，而且与日俱进。

三

容闳以美国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作为标本，期望旧中国能按他的留学教育计划逐步改变原有的落后状况，成为一个先进的强盛的国家，这种良好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愿望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

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热心于国事的政治活动家，在野的政治家。他没有政治野心，不谋高官厚禄，一心为中国的富强而奔走呼喊。难能可贵之处是他长期接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系统教育，而仍保存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质和一颗黄金般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有强烈的对祖国的使命感，虽久居西方国家而一心惦念如何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他不以局外人自居，而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仁不让的责任心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投身于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前进。归根结蒂，他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优秀代表人物，是与洪秀全同时而比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更早的为中国近代化而奋斗的先驱者。

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学术界过去对容闳的历史评价颇不一致，有的认为他是“洋务派”，甚至是“洋务派的走卒”；有的说他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的说他是买办或“甘为美国资本效劳”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还有人说他是“中国近代出外留学、对外开放史上著名人物”、“一向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启发‘中国的新文化运动’”。^① 差距如此之大，除了史料掌握和着眼点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观点上的偏差。其实，如前文所述，容闳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是有着积极影响的人物，当时他在国内知识界、实业界和改革派士绅、名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章太炎称赞他“天资伉爽、毫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②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很敬重容闳，19世纪末，他曾对人说到对这位他的同乡前辈的看法，认为“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

^① 梁伯华：《容闳的西学与洋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第十五卷，第1期（1985年）。

^②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附刊《鼓吹录》。

望”^①。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由于容闳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地位，1912年2月，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邀请容闳回国参加民国建设。在邀请函中，孙中山称容闳为“老同志”，词意极为恳切，赞许容闳热爱祖国，与他自己一样，都是“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和他是“同病相怜”，因而很能理解容闳饱受流离颠沛之苦和“久离乡井，祖国萦怀”的迫切心情，“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以襄助国家建设。^②但邀请函寄到美国，容闳已因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此后，1912年5月3日，上海《民立报》曾刊登标题为《革命第一伟人》的启事，说的就是欢迎容闳归国之事（由于音讯隔绝，这时容闳已逝世了十天），内称容闳“数十年前主张平民政治，乃革命之实行家也”，因他“现尚避地海外”，号召说“际兹共和国成立，亟应以全体国民之诚意欢迎归国为后进之指导”，“启事”后署名的是革命党人沈翔云，^③由此可知国内进步力量对容闳的期望了。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对容闳应予肯定的历史评价，容闳的生平事迹充分说明他是一位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开辟道路的先驱者，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对祖国的进步有着重大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和不断前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我们应当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值得高兴的是几十年来认识容闳的光辉事迹及其积极作用的人渐渐多了，人们用各种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143—144页。

③ 《民立报》1912年5月3日，第577号，见《民立报》合订影印本第十七册，第4059页。

论容闳的爱国主义其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方式来纪念他。在上海，著名的交通大学早在1933年4月8日该校40周年校庆时，就建立起“容闳堂”，塑造了一尊容闳的铜像，并在校刊上登载容闳的生平事略和更大篇幅的传略^①。1947年广东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印出版《中山文献》，在创刊号上将容闳作为“人物传”的第一人。容闳在美国知识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母校耶鲁大学于1876年授他以法学博士学位。1954年6月13日，耶鲁大学又举行集会纪念他毕业该校100周年，由前雅礼学院院长霍华德报告容闳事迹及其重要意义。美国学术界对容闳及其倡导和带领赴美留学的一百余名早期留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评价很高。1972年8月，适逢容闳率领第一期留美学生到达美国100周年，当时我国政府尚未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教育部长”蒋彦士通过留学生在位于美国哈特福德城西带山容闳墓地前竖起一块纪念碑，称赞容闳“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②。1983年12月，容闳的家乡广东省珠海市政协隆重举行群众集会和学术报告会，纪念容闳诞辰155年，邀请国内和港澳等地专家学者和容氏家族后人以及珠海市中小学学生共一千数百人对容闳爱乡的光辉事迹进行宣讲，并出版了纪念专刊^③。容闳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在美国出版后，由徐凤石、恽铁樵译成中文，最初在《小说月报》第6卷1-8期（1915年）发表，取名《西学东渐记》，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当年12月排

① 唐仕进：《交通大学的容闳纪念堂》，《珠海文史》第2辑。

② 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1970年3月）。

③ 珠海市纪念容闳先生诞辰155周年报告会筹备委员会编：《纪念容闳专刊》（1983年12月）。

印初版，以后曾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过，作为“史地小丛书”之一种。改革开放后，由张叔方补译，1981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经王蓁重译，书名改作《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订正和补充了1915年旧译本错译和漏译的内容，又订正了原著中的一些事实错误，于1991年10月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1994年中山大学接受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的捐赠，在校园里竖起了我国近代18位自林则徐到孙中山的先贤铜像，容闳也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是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于3月26日和9月间先后举行了中美文化交流演讲会和学术研讨会^①。作为容闳的家乡珠海市人民政府又于今天隆重举办了这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并举办了容闳生平事迹展览等有关活动，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容闳，让这位中国近代史杰出的爱国者，享有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对此，我们深表赞同并积极支持。

我们深信：容闳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而永垂不朽！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4月7日第3版报道。

论容闳的报国心

林家有

引言

钟叔河先生在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再版时，写了一篇《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的文章。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的绿荫深处，一块方座圆顶、正面刻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的墓碑后面，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死葬在异邦绝域，他的心却一直眷恋着祖国，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

.....

正如容氏在他这部惟一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所叙述的，他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国，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到筹办江南制造局，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洋，到参加维新变法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革命活动，他整整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用这本书的名字来说就叫“西学东渐”）的道路，不断地“上下而求索”的一生。^①

容闳的一生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伟大举动，也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他朴素而执著，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的爱国者。他的确是“洋装穿在身，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中国学者的典型。他的一生是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和富强而努力的一生，他留给后人很多启迪，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说：

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②

容闳做的多，说的少，但他具有中国文化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德，尽管他在美国留学并成家立了业，可是他真正做到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爱祖国、爱人民，追求西学是为了有益于中国。他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虽然最终不得不“远托异国”，直至埋骨在海角天涯，然而，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下引本书的内容均见此中译本。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自序”，第1页。

因为他为了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祖国和人民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为“造福中国”，走向世界

容闳于1826年11月17日出生于离涉外口岸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容闳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然而，当容闳七岁时，他的父亲容丙炎，却愿意通过熟人将儿子送到澳门洋学堂去学习。后来，容闳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①

就这样，容闳入了澳门马礼逊预备学堂读书。父亲只是希望儿子进了洋学堂学好外文将来谋个翻译工作，而容闳虽则聪慧伶俐，但却不太用心，起初他对马礼逊预备学校的严格管教不能适应，又因家贫辍学。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堂，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神学博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老师。在布朗先生的资助和教授下，容闳进步很快，学习成绩名列榜首。1846年冬，布朗回国，并将容闳、黄宽、黄胜带往美国，从此改变了容闳的人生道路。他克服了社会的偏见与母亲的劝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阻，勇敢地走向了世界。

1847年1月4日，容闳乘美国奥利芬洋行（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亨特利思”（Huntress）号商船，由广州黄埔港起航，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绕道好望角，再入大西洋，历经98天之久的航行，于1847年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港。一星期后，容闳在布朗先生的安排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孟松学校为新英格兰最有名之预备学校。校长海门（Rev Char Les Hammond）“德高望重，品学兼优”，“夙好古文，兼嗜英国文艺，故胸怀超逸，气宇宽宏”。^①海门校长对容闳特加礼遇，甚望其学成归国，能有所设施。1848年秋，容闳立志报考耶鲁大学。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入耶鲁大学深造，并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欲取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先具保证书，毕业后要以传教为职业。容闳没有同意同校方具结志愿书。为什么？他写道：

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对予极抱热诚。而予之对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论容闳的报国心

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为始基宜慎，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嗣海门悉予意，深表同情。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①

由此可见，容闳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神职传教士，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安逸，而是有益于中国。正由于容闳抱着有益于中国的目的而在美国深造，在1847年至1857年的十年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他“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他努力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及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曾诵习多数英国之文集”。他的微积分成绩虽不甚好，但“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②但是，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言：“对于一个思想敏锐而又时刻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的青年来说，化学实验在玻璃仪器内显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微积分可以启发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地感觉到专制制度的违反人性和缺乏道德基础。”由于知识的积累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了解越多，使容闳懂得：到外国留学，不能只学各科常识和外国语言，那样做“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

^{①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第15页、21—22页。

哉”！^① 容闳所学为所用，他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直接熏陶于西方文化，摄入西方的新知识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所以诚如同时代的美国友人布思所称赞的，容闳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他除了要完成他自认为对其人民极为有利的工作外，并无任何个人野心”。^② 孙中山也说容闳“才智学识，达练过人”，“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③ 这些都反映容闳虽然自幼赴美留学，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具有身在异国心在乡邦的报国心。

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1854年夏天，容闳在学完美国耶鲁大学规定必修课程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了学位的中国人。像容闳这样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又刻苦干练、热情有为、英语很好的青年，他不愁在美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他不图个人的安逸生活，毅然决定回国，报效祖国。他当时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说：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不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页。

^②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2辑，第29页。

^③ 孙中山：《致容闳函》，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论容闳的报国心

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①

这是说容闳的条件不错，他如果从个人的享受去考虑，他可以不回国。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关系的吐依曲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也指出：只要容闳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了教义，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像是从整个民族中被挑选出来去接受恩典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自私自利。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②

《圣经》是否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不可知，但容闳惦记着他的祖国，希望祖国终有一天同美国一样兴旺发达则是真的，恐怕是后一个原因促使容闳踏上回国之路，报效祖国。但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很快他就发现，他对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已经很陌生，中国虽然没有忘记他这位海外学子，但他似乎已不太了解中国。一方面，“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使他每一念及，便“辄为之快快不乐”；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不应存此悲观”。他说：“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② An address by the Rev. Joseph H. Twichell.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ppendix, pp. 256-258 (1990, New York), 中译文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页。

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并说，还在耶鲁大学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正是由于容闳胸怀祖国，他才毅然回国，想把所学“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

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西方侵略的问题。容闳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的美国作科学的分析，但他却保持了国格和人格，他致力于“西学东渐”，然则无论在美国读书，或在香港、上海工作，他都坚持以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宁可辞去有伤民族尊严的工作。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容闳则同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认识到：仅仅学一点西方的“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在这方面，容闳的一生走过的道路，他的思想和足迹，总可以留作我们借鉴。

然而，在一个外受欺凌、内存忧患的国家里，尽管容闳要报效祖国，决非易事。他返国后，遇到种种困难，首先是中国语言文字不通，其次难于找到适合发挥个人专长的工作。他曾任美国传教士伯驾的私人秘书，原以为可以通过伯驾接触清朝官员，实现其改革中国的计划，谁知伯驾对此不感兴趣，且每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论容闳的报国心

月工资只有15元，容闳干了几个月就辞退了。随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工资较高，每月可得75金。然而，当翻译毕竟不是容闳的理想职业，他想学习法律，做开业律师，但为英人排斥，只好放弃此工作。不久，他到了上海，在海关充当翻译工作，薪水倒很优厚，月薪达75两白银，但容闳看不惯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只干了三个月便辞退不干。在辞职书上，容闳铿锵有力地质问上海海关税务司李泰国：“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李以月薪200两白银加以挽留，但容闳以“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①一走了之。可见，容闳“爱护祖国之念甚强”。他“爱护中国之忧，诚非一般人所能企及”。^②经过几番蹉跎，容闳通过赴美办购买机器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官员的信任，后在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心中蕴藏了十几年之久的教育救国计划，终于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于1872年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实现了其建议派学生去美留学的计划。这是容闳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容闳的努力下，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曾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③，成为中国直接派遣留学生出国向西方学习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②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5页。

③ 1872年8月11日，经过考试遴选的第一批留学生30名启程赴美。1873年6月12日、1874年9月19日和1875年10月14日，又有三批各30名学生先后赴美。这些学生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大都是东南沿海一带人，广东省的最多。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14页；胡光熙：《早期出洋的留学生（1872年—1912）》，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第71—74页；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开端。尽管容闳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由于清朝顽固派的反对，未能完成原定的15年的留学计划，中途被迫撤回。然而，容闳的努力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革、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经过留美学习成长起来的科技人员及其他方面的人才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开平煤矿的著名工程师邝荣光，工程建设专家邝炳光，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的开拓者梁宝荣、程大业，近代中国铁路技术专家詹天佑，以及许多铁路建设的经理、总办、董事、工程师都是早期留美学生。有的留美学生如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还参加中法战争并壮烈牺牲。在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中，陈金揆任致远舰大副，与邓世昌紧密配合，冲锋陷阵，英勇殉国。沈寿昌、黄祖莲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还有一些留美学生活跃于外交、文化、教育界，默默耕耘，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① 所以，人们称颂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是对他教育救国实践的肯定。容闳热切追求中国社会的巨变，他致力于“西学东渐”，但不局限于翻译几部英文著作，介绍一些外国知识，而是将精力集中在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他的事业是对中国近代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具有开风气、创世纪的意义。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② 这一分析，恰当地反映了容闳在留学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① 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中国留学幼童书信集》，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第34卷第3期；高宗鲁译著：《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100页。

^② 《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页。

终于寻找到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的反对，容闳以通过争取清朝同意派遣留美学生，为中国培养人才，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受阻。容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①的理想落空，容闳的心情可想而知。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夭折和美籍夫人凯洛格的去世，给容闳的打击甚大。他说：“一个使我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计划被搞垮，另一个是剥夺了我只度过十年的幸福家庭。”因此，感到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他在美国蛰居下来，过着无所作为的生活。大约在1887年新年期间，容闳用毛笔写下新诗一首，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②

这首诗表现了容闳内心处于低潮时的真实情景。

中年丧妻，事业受阻，人所难堪。然而，容闳毕竟是一位有坚强意志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人，他不会因家庭的不幸和自己的报国事业受阻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即乘船归国。1895年初夏抵上海。此后他曾向张之洞和清吏提出了改革中国的许多新主张，如聘请外国人为中国外交、财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② 这首诗的原件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政、海军、陆军的顾问，建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这些主张均由于清政府的极端腐败未被采纳。容闳说：“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① 此处所说“救助中国之心”是指扶植清朝政府之心，也即是说，他通过为清政府效命，改革中国的思想已经彻底泯灭。因此，容闳必变主意，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此时的容闳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但他积极参与维新派的一切活动。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他积极设法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出京，失败。容闳也成为通缉对象，出逃上海避入租界，后又避难于香港。由于清朝顽固派反对中国进行改革，使容闳认识到在保留清政府的情况下中国不能振兴，国家也不能富强，因此他思想中的激进因素不断增强。1900年容闳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7月，在上海召开自立国会，通过容闳起草的宣言，并选容闳为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但自立军起义事泄，长江一带大捕党人。容闳于9月1日化装变名“泰西”乘船离沪走日本。^② 容闳在国内从事振兴中国的努力也宣告结束。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时，容闳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当这位身居美国的老人听到自己曾为之努力改革的祖国发生了巨变时，他兴奋不已。1911年12月，容闳中风在床，但他仍忍不住喜悦的心情给老友谢纘泰写信。

目前在中华帝国发生的政治现象在历史上确是非凡而空前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② 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论容闳的报国心

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

我真诚地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来敌对目前遍及全国的平和的情绪。如果领导者的个人野心产生并占据了他们的心，将加重混乱、无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将导致整个中国被瓜分。

愿所有中国的爱国者警惕这种危险，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①

信中不仅表明了容闳已看出清政府即将垮台对古老中国发生的深远影响，而且还清醒地看到野心家可能会登场争夺未来中国的领导权。他告诉爱国者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要警惕野心家和外国的干涉。同时表示只要他健康允许即将回国为国家 and 人民效力的愿望。尤其可贵的是容闳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袁世凯是个野心家，劝告革命者绝对不要相信连光绪主子都出卖的袁世凯。他说：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1898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了吗？难道要信任一个叛徒吗？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的总理

^① 广东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中译文引自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清人一起撵走。^①

孙中山对容闳心仪已久。容闳与孙中山同属香山人，但他比孙中山大38岁，算是孙中山的父辈。1900年9月孙中山与容闳在日本长崎会见之前，一直未曾见过面。经容星桥介绍，两人一见如故。容闳劝孙中山回国，南下台湾观察华南的局势，并亲自筹划惠州起义。容闳鼓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②为志。容闳也从长崎赴香港。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谋划在广州起义，拟推容闳为大总统。事泄后，未遂的大总统容闳再度逃亡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不仅在华侨华人中争取支持者，还向美国人介绍孙中山。1909年，容闳邀请孙中山去美国，与荷马李和布思等一起商议制订革命计划。后来，孙中山与荷马李等密谋的美国长堤计划，就是容闳一手促成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容闳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孙中山能“当选下届大总统”。当时容闳患病在床，但他还记挂着新政府的财政问题，并让儿子容觐槐回国，为新生的共和国建设事业服务。

孙中山收到从谢纘泰转来的容闳的信后，于1912年2月写信给容闳邀请他回国辅政。然而，4月21日，容闳去世。

^①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② 刘蜀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页。

毫无疑问，容闳是一个具有强烈报国心的爱国者，正如美国牧师吐依曲尔于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的演说中，评价容闳：

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①

用不着称什么“家”， 容闳也同样是值得称颂的“伟人”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也无论接受何种文化的熏陶，都依然有一颗中国心。只要有这一颗中国心，他就是民族的脊梁，就是祖国的希望。英国人罗素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需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②

罗素又说：

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代跋”，第 15 页。

② [英] 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59 页。

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曾经遇到有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亚于我们的教授，但并不因此失去与自己人民的联系。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弱者和纯物质的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①

罗素说得对，容闳就是如罗素所说对于西方的科学如痴如醉，“照单全收”的人。他是致力于“西学东渐”的智者和勇者。虽然容闳经历了清朝政府的迫害逃亡到了日本和美国，但他仍然执著地热爱他的祖国和人民。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无他，是因为他对中国怀有“永恒热爱”，企图祖国得到迅速“改革和复兴”，像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一样享有他应有的地位。

容闳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实业家，但他一生的经历则丰富多彩。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经过商、办过教育、作过小官、办过外交、搞过企业，但从哪一方面看，他都称不上是什么“家”。不过他的爱国则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所以用不着称为什么“家”，他也是中国伟大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真心实意地报效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他付出的不仅是精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惟其如此，他就称得上伟大和杰出。我们怀念他和纪念他也是因为他具有

^① [英] 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论容闳的报国心

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不是由于容闳曾是什么政治家、实践家。

容闳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

朱新铺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提出“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富强文明之境”的爱国主张，并为中国的近代化奋斗终身。现就容闳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作一些说明。

—

公元1835年，年仅七岁的容闳即就读于英籍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开设的西式学堂，1841年后，又进入马礼逊学校。在他的这段“幼稚时代”，“和蔼仁厚”的郭士立夫人的潜移默化使容闳受到良好的西方启蒙教育；“小学时代”，又得“不厌不倦”的勃朗校长的循循善诱，容闳打下了结实的英文基础。而他的“中学时代”则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最著名的预科学校——孟松学校度过的。在孟松学校校长、大教育家海门等名师指引下，容闳顺利地踏进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在美国第一流大学——耶鲁大学的四年中，他刻苦学习，

专攻“英国文论”。为此，他的西方文化修养获得了耶鲁师友的赞赏，“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在此期间，容闳不但完全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感情世界也与西方社会相逐。故郭士立夫人、布朗校长、海门校长等西方人士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与耶鲁校友的感情也深厚难忘。他不但熟悉美国社会，而且视美国为第二祖国。娶美国女子为妻是他平生一大理想，并得以如愿以偿。

但容闳并不因此而“数典忘祖”，成了“假洋鬼子”，恰恰相反，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容闳培育了自己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国思想。

容闳的爱国思想有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以西方学术谋求中国文明富强的爱国理想

“幼稚时代”的容闳，经历了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巨变。故从他远赴异国之时起，就从来没有忘记西方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没有忘记清政府的腐败给民族带来的屈辱。在“中学时代”，容闳遥看国家的日益沉沦和亲历西方社会的蒸蒸日上，其民族忧患意识与日俱增，遂把努力求学以报国视为“应尽之天职”。在耶鲁深造中，无时无刻不怀抱报国之志，故“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所以，当容闳学成归国之时，“虽经多年西方文明的教化，但他并没有如资助其留学的西方商人、众多的美国师长所期望的那样，把当一名传教士作为自己的理想，也没有如他的父母所冀望的那样，“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的优缺”，而是成为了怀抱有“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远大理想的爱国者。当时，他虽“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了”，但却立刻把理想付之行动，决心“专

心致志而为之”。

对西方之学术，容闳并不照搬，如西方之宗教，他认为“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的事业”。他主张对西方的学术要“择其有益于中国者而为之”，其中尤要探求“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知其秘钥所在”。在容闳看来，除西方的先进技术外，“欧西成规”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精神”、“活泼思想”等西方人文精神，都是能使中国由“老大帝国一变而成为少年新中国”的“西方学术”。

（二）具有近代人权观念的民族自尊感情

容闳自小生活于西方社会，惯与友好的西方人士平等交往。故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及出于“迷信而顽固”的盲目排外行为，他都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但在他心目中，民族的自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西方人以强暴“伤中国人感情”者，他必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归国之初，容闳在上海曾两次奋起反击西方狂徒之凌辱。一次逼使了逞凶的美商船船员登门谢罪；另一次则当场把一苏格兰流氓打得“唇鼻立破，流血破面”而逃走。当时，像容闳那样不为“彼族凌辱”，“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在租界华人中为前所未有，引起了外人之震动，“事阅数日，外人犹引为谈助”，“更有多数中国人，因闻予为此事，异常推重”。但容闳却由此而痛感国人缺乏近代人权观念，“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为此，他认为必须对国人进行近代人权观念的教育，让“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三）捍卫国家主权的反帝意识

与西方列强侵略抗争，全面捍卫国家的主权是容闳坚定不

移的爱国立场和行动准则。

容闳筹办江南制造局时主张，江南制造局“必须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同时，他又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自己的机械工程师。“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从而谋求中国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近代生产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以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容闳主张发展建立自己的航运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在这里，容闳主张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以对抗西方列强对我国沿海内河的航运主权的侵夺。他还提倡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筑铁路以利交通”，“使政府知中国实有无穷厚利”，从而可达到增强防范西方列强掠夺我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意识。

容闳对西方列强侵犯我国司法主权尤为深恶痛绝。他认为，中国人应与西方“侵夺我治外法权”进行抗争，以遏制“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他还愤怒地指责西方宗教势力对我国司法主权的损害，“彼天主教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的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为此，他要求清政府，“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容闳认为中国应“力图自振”，对“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进行抵抗，以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

容闳出任中国留美学生的事务所副监督和清政府驻美副公

使时，在涉外事务中，坚定不移地履行国家赋予的外交自主权，调查和揭露了秘鲁政府对华工的虐待，公开抨击了美国国会和政府煽动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和对中国实行强权外交的行径。

由此可见，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爱国主义者。

二

1855年，容闳作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的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从那时起，直到1902年为清政府所通缉而离开故国为止，在约半个世纪中，容闳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奋斗不息。其中，他办了为历史所公认的两件具开拓性的大事，“第一件是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第二件是在中国组织了四批官费留学生——遣送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其实，容闳更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关于在发展近代化生产的同时，必须对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张。

出身于穷苦农家的容闳，儿时未能“在旧塾读书”，而被父母送入免收学费的“西塾”，青少年时代则成长于美国社会。为此，容闳能在一个完全没有中国封建思想束缚和政治专制的压力的社会环境中，“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学习汲取西方的文化营养。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特殊经历，使容闳比之与其同时代的或者后来的“志于西学”的中国仁人志士，能更全面地把握西方文明的历史源流，对西方文化的本质亦有较深刻的认识。

为此，容闳作为中国的“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位捷足先登者，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就能用一种近代的历史观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他说：“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和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在这里，容闳指出中国要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进入近代社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根本改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一）关于“国体和政治上”改革的主张

容闳认为，“国体和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必须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的这种政治革命思想萌发于归国之初，出于其对清政府残酷镇压广东人民起义的仇恨。当时，容闳“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后来，他虽对太平军的失败认为必然，但却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贡献，“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唯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以后，容闳虽置身于洋务活动多年，并对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些人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视曾国藩为“清代第一流人物”、光绪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但他对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却是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如他说，“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遵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而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欺诈机关矣”。如此，容闳坚认，在中国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是不能免的。在19世纪

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兴未艾时，容闳即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国体和政治上”的革命的时机到来，从而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一边，视孙中山为中国之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给革命以最真诚和实际的支持。

（二）关于用新的历史精神改革旧文化的主张

容闳认为，要根本改革中国两千年陈陈相因的旧文化，必须“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历史精神。在这里，容闳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文化改革的主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容闳不可能为自己这种超前的文化改革意识构想出一整套可行的办法。为此，他只能从个人的经历体验出发，认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培养实现中国文化根本变革的所需人才，“亦救国之唯一政策”。

因为他认为，中国留学生自幼在国外生活，即受西方教育之“陶冶”，又习于西人交际，“故意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西人的“同化而渐改其故态”。更为重要的，留学生在外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而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一改“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具有了“自由精神”与“活泼思想”。为此，容闳认为，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是中国实现经济近代化所必需的人才，而且因为他们能准确把握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故能给中国古老文化贯以新的历史精神。

由此可见，容闳乃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具有民主主义革命倾向的社会改革主张者。

容闳，在西方文化的教化中成长而爱国之心坚如磐石；为

容闳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奔走多年，但革命之志一以贯之。他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中，融汇中西以求国家富强的思想原则的运用，“谋食亦谋道”，“以成伟大之事业”的人生价值取向，至今仍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应予发扬。

注：文内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摘自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从渐变到质变 ——略论容闳思想的两次飞跃

任贵祥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一个闪光耀眼的名字——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外交家。有关他的留学活动、教育思想，已有论著介绍，本文只在阐述容闳一生思想和实践的两次飞跃。

一、从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

容闳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危机四伏。容闳 13 岁时，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其家乡广东香山县南屏乡首当其冲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容闳少年时代先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香港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在外国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到美国读中学、大学，1854 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可见，容闳青少年时代受到的中小学、大学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迥然不同，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影响而纯然接受的是西方

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容闳早期的思想，即打上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较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容闳虽然完全接受到的是西方教育，但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在美国谋得一个优裕的职业，而是毅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以效报国之志。

容闳回国后，为自谋生路奔波了七八年，曾给美国驻华公使当私人秘书，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当通译，曾任几家洋行的职员，并访问了太平天国辖区及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七条改革建议。经过考察，他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满洲政府之政治”的没落腐败，但也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进而认为太平天国不能取代清王朝建立全国政权，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遂返回上海经营茶叶等活动。

1863年初，容闳经在曾国藩处当幕僚的友人的介绍，投奔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在策划镇压苏、浙、皖一带的太平军，他很看重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打算创建一座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仿造洋枪洋炮等武器。当曾国藩从自己的幕僚处得知容闳的学历后，很感兴趣，拟招其面谈。容闳获悉曾的意图后，欣然前往，从此投入曾国藩的麾下。通过两次面谈后，容闳对这位洋务派的开山鼻祖，很是佩服，“一见即识之不忘”，“奉为泰山北斗”。他敬佩地说：“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7页。

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① 面谈后，曾国藩利用容闳在国外的关系，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赏给他五品军功，拨付大笔资金，派他出国购买机器。从此，容闳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也是洋务派的一名重要成员。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积极从事洋务运动。

容闳身负曾国藩的重托，经欧洲辗转来到美国，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他经过一年艰辛，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运回国，于上海高昌庙装机建厂，是为江南制造局。容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曾国藩赞赏并向清廷奏请，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官衔。1866年，曾国藩参观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参观并为之讲解，曾国藩颇为赞许。容闳趁机建议在厂旁设一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以备将来代替外国技术人员。此议也得到曾国藩的批准而施行。随后，又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十余年间翻译国外书籍百余种，其他洋务企业群起效仿。“江南制造总局遂蔚然成为洋务与西学重镇。中国之有现代建设与巨量之西学译述，盖自此始。”^② 由此可见，容闳和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容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对容很信任并予以重用。随后，容闳与另一洋务派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交往甚密，一度成为丁的幕僚。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与容闳也有密切关系。1867年容闳草拟条陈四项托人代奏朝廷，其中第一项即为“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第三项“开采矿产”与“兴筑铁路”。“惟其后朝野所办洋务，多以容氏条陈为引端。如招商轮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87页。

^② 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第45页。

船公司之设立，即以容氏条陈为起因也。”李鸿章在建议设轮船招商局时，即援引“同知容闳，创华商造船章程”。这说明，“招商局之所由设立，即以容氏主张为始基也”。容闳开矿筑路的建议，也相继被洋务派所采纳，“李鸿章于光绪四年（西元1878年）尝集银27万两，于天津创设开平矿务局，专办煤矿；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西元1890年），创设汉阳铁厂，旋即开采大冶铁矿。李张二人固皆重视容闳氏，尝与商讨洋务，而受其影响者也”。另外，“中国已有新式银行”，亦即清朝后期所设大清银行，“推原其始”，“亦自容氏所倡导也”。总之，自1863年容闳投入曾国藩麾下，到“戊戌政变前，所创立与倡导洋务建设之较著者也”^①，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容闳是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的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但他并非是推行洋务运动的实权派和决策人物，因此，容闳对洋务派的主要官员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影响他们，而未起到决策性作用。

另外，容闳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也有些直接交往，并一度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如1873年春，容闳“为了将美国新出的格特林炮输入中国，曾特返国谒直隶总督李鸿章，经李鸿章同意，订购五十尊”^②。容闳回国不久，李鸿章又委托他办理与南美洲秘鲁专使来华招募华工交涉事宜，并秘密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容闳与秘鲁专使交涉及其赴秘调查，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秘鲁迫害华工暴行，维护了华工的利

^① 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第46—47页。

^② 《中国前途的探索者——现代中国思想家》，台湾巨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

益，坚决拒绝了秘鲁继续在华招募华工的图谋。他的主张得到李鸿章的采纳执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在美国的容闳急祖国之所急，向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写信，提出向英国借款购铁甲舰、雇洋兵抄袭日军后路的建议，得到张之洞赞同，并命容闳赴英办理，后因李鸿章（李与张之洞有隔阂）和英国人赫德的作梗未成。

综上所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容闳投入洋务运动的时间是很长的，为洋务运动做出很大贡献，尤其对洋务派倡导的“西学为用”的方针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是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对外交往的代表。其二，容闳与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张之洞有着许多交往，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容闳的许多思想得到了他们的采纳实施；他热衷的留学生计划，也得到了洋务派的支持而成为现实。在思想上，容闳与这一时期的洋务派官员，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容闳是洋务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但是，容闳与上述几名主要洋务派官员比较，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他的封建保守性小，更多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容闳“改造中国”的计划和活动中，教育救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他期望，“予之教育计画〔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这些又是上述洋务派官员所不具备的。容闳所以成为洋务派成员，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没有较大作为，维新改良运动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容闳所致力于挽救中国活动，与洋务运动自然合拍。容闳与其他洋务派成员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当维新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能迅速实现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而其他人却仍抱残守缺，不能实现这种转变，这是

他们质的区别。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失败。1895年夏，留居美国十余年的容闳回国后，先是拜见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张提出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建议，而张以极为傲慢和冷漠的态度接见容闳，对其建议嗤之以鼻。容闳失望地回到上海，任了三个月的江南交涉员的空头官衔后便请辞职，决定不再担任清政府的任何官职。此后他又向清政府提出过建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改革建议，也未被理睬，使他一度变得消沉起来。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破产，自己满腔的救国热忱遭到冷漠，使容闳对洋务派及清政府大失所望，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容闳与维新派频繁来往，积极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维新派对容闳的爱国主张和学识，很是器重，其思想与他们的新政主张不谋而合。如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的改革方案里，就有拨巨款建铁路、练兵购舰、兴办学堂、开办银行等。康有为甚至向光绪推荐容闳，要其前往美国商借巨款，作为推行新政经费。而容闳对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主张，深有志同道合之感，并积极投身其中。尤其是他看到光绪皇帝“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光绪帝“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①他对光绪所下的每道改革诏旨都完全赞成和支持，认为这都有利于促使中国向西方学习和改造中国。当然，容闳在赞扬光绪皇帝锐意革新的同时，对他抱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44页。

以厚望，评价过高。无疑，这时容闳已完成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

容闳不但在思想上，“素表同情于维新派”，与康有为“结为密友”，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如他自己所说：“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①他本人一度成为维新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但是，自1897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分子，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只有103天便告失败。容闳因犯“隐匿党人之嫌”，亦在顽固派密令逮捕之列。危急时刻，谭嗣同约请梁启超、容闳等紧急商议挽救办法，认为首要任务是保护光绪皇帝，遂决定分头向各国驻华使节呼吁求救。容闳去见美国公使，被拒绝。无奈，容闳只得化装潜逃到上海租界。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容闳深感痛心，认为中国政治可能出现大的倒退，深感改革的异常艰难。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救国活动，其思想上逐渐由赞成改良向支持革命转化。

二、由改良派转向革命派

维新变法失败两年后，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侵华，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这时，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义勤王。起义前，即1900年7月26日，唐在上海邀集社会各界名流八十多人开会，打算起义成功后拥戴光绪出来执政，打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44—145页。

力。这次会议被称作“中国议会”。在选举会长时，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即由容闳向会议宣讲宗旨。后来，“中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唐才常被举为总干事，容闳兼管对外联络事务。他当时起草了一份英文对外宣言，表示“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但又宣称“端在复起光绪帝”；既表明要“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又声明“力为保护”外国租界、教堂及外国人生命财产^①。实际上想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废黜慈禧太后，使光绪帝重新执政。

从容闳上述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模糊的，幻想得到列强的支持废慈禧、救光绪是不现实的，等于与虎谋皮；但也反映出容闳从过去的改良主张，转变为要用武装手段，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这和康、梁等改良派主张的挽救光绪重新执政，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是一致的。其实质仍是改良思想。

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时，曾联系张之洞幻想得到支持，企图联合长江各省，以成立“中国独立政府”。结果反遭张之洞的镇压，唐才常被捕牺牲，容闳被通缉逃往日本避难。逃亡途中，在轮船上巧遇孙中山，这是他们二人初次见面。他们在船上彻夜促膝谈心。孙中山阐明了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容闳很受启发，实践使他认识到，走改革的道路，确实难以走通。这次见面，容闳对孙中山印象很深，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而孙中山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4—75页。

热心于改革救国的老前辈。船抵横滨后，二人一同上岸，“在旅社闭户密谈甚久”，随即一起去了一趟东京。有关容、孙密谈的内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在日居留期间谈论帮助孙遂其宿志。”^①显然，密谈的内容涉及到帮助孙中山实现革命大业。因此可以说，容闳与孙中山的这次会见，是他思想上第二次转变的开始，亦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起点。但他并没有真正划清改良与革命的界限，在一段时间里，他在同情革命的同时，仍没有与康、梁改良派断绝关系。

容闳在日本居留不久即回到香港。1903年初，华侨兴中会员谢纘泰（谢先是旅居美国后移居澳大利亚）等发动反清起义。谢居美国时曾与容闳相识，故筹划起义时，“求容氏臂助，容氏极为赞许，谓当为赴美谋取外援”^②。容闳遂前往美国，“方欲进行联络”，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便留居美国。在美国，他继续从事救国活动。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转向革命一边，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康、梁的保皇派，共同推翻清王朝，而且和康、梁联系较多。在1902年5月27日，容闳赴美途中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等人会面，莅美后与保皇会要员信函往来，并为保皇会募款。1903年4月，梁启超访美时，还特意去拜望容闳，两人晤谈约两个小时。容闳以76岁高龄仍“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使梁钦敬无已^③。1905年康有为访美时，也去拜望他，他还两次亲自陪同康有为去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

^①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② 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第53页。

^③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31页。

从渐变到质变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康、梁保皇派反对和破坏革命愈加激烈，使容闳逐渐觉悟，并开始同康、梁决裂。1908年7月，容闳给谢纘泰的信中，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1909年1月，在容闳的通信及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均指责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①，并揭露康私吞华侨为支援维新运动捐献的大笔捐款，认为“康有为内心更加关注的是政治权力、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②。1910年4月，容闳给谢纘泰的信中，更是激烈斥责康有为及其弟子。

与此同时，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革命，与孙中山关系愈加密切。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很重实际的人物，是“最可信赖的”。容闳写信给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劝其与康、梁保皇党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介绍给孙中山，使这两位美国友人由支持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1909年底，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按约定与容闳见面会晤，这是他们生平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推翻清政府，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所用。翌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知其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请他与荷马·李及布思会晤，商谈借款事宜。孙中山与两名美国友人多次磋商，确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后因美国金融资本家不肯冒险借款，这个计划成为泡影。

与康有为保皇党决裂，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标志

^①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31页。

^②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2页。

着容闳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的最终完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80多岁的容闳欢欣鼓舞，他给谢纘泰写信兴奋地说：“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信中表示：“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一个星期后，他又给谢写信，请其转达向孙中山的祝贺：“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千万替我向他致衷心的祝贺。”^①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请其“归国任事”，信中说：“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②容闳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表示“备极欢迎”，祝愿“中华民国创立一完整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信中建议孙中山组建“一支共和国军队”，聘用“有经验的能干的美国人以纯咨询之资格担任……助手或顾问”；在资金方面，向美国“寻求国外贷款”；最后表示：“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③他还打算以老迈病重之躯回国祝贺，“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但1912年4月21日，84岁高龄的容闳与世长辞，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临终前将自己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介绍给孙中山回国服务，以完

^①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② 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第52、53页。

^③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第336—337页；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5页。